

## 故乡的葡萄树

葡萄是我熟悉的旧物,但我小时候见到最多的是野葡萄。野葡萄藤和葡萄藤外形上并无太大差别,但结出的果实个头差别很大,野葡萄粒如鸡头米大小,或者比火柴头稍大而已。

我在前黄中学读初中时参加了生物兴趣小组,曾经割了野葡萄老藤扦插,试图给它嫁接,但失败了。我写江南旧闻时写过《人人都爱野葡萄》。我很晚才知道野葡萄也是酿酒的好材料。我写“一个酒鬼的诞生”系列,研究了一下通化葡萄酒的历史,才知道最早通化葡萄酒是日本人用山葡萄酿制的,当时已经很有名。

父亲说,旧时我们村祠堂里有一株挺大的水晶葡萄,惜我晚生未曾得见。我所知道的是我们西朱周边十多个村庄,只有3株葡萄。西朱东朱仁琪家外墙边的菜地里有一株,下面还放了口棺材;张家塘我同学朱卫东家门口有一株,葡萄架大半覆在河面上空;夏家塘我母亲的亲姨兼寄娘我舅婆家明堂里有一株。

偷葡萄是乡村男孩少年时代的必选动作。我个头虽小,偷葡萄却是一把好手。东村仁琪家那株葡萄虽然离我家最近,但通常轮不到我们惦记,西朱东调皮的小孩多,近水楼台,先下手为强。我也不是没偷到过仁琪家的葡萄,但通常得和东村的玩伴合作分赃。夏家塘舅婆家的葡萄在自家明堂里,我只有逢年过节跟着母亲走亲戚才去。过七月半去,如果还能分到几粒葡萄,已经是惊喜了,通常早早给舅婆的亲戚家其他孩子惦记走了。

我小时候偷葡萄最多的是朱卫东家。他父亲是兽医,和我父亲相熟。我跟卫东小学一个班,也是好朋友,但偷葡萄从来没有因为熟下不了手。卫东的奶奶夏天常躺在家门口乘风凉,兼看守葡萄。他们家葡萄正好在河边,我们从稍远的地方悄悄游过去,钻到葡萄架下,先吃个痛快,临走还要在短裤里塞几串,手里各拿一串走。等卫东的奶奶发现,拿着竹竿追赶,我们早已上岸跑走了。

这三株葡萄死于何时,我已经不知道了,大概那时我已经离开故乡了。

故乡如今遍种葡萄。我们村原来种稻麦的地方大部分也种了葡萄。葡萄的大规模栽种,一源自粮食已经足够,二源自种田挣不到钱,三是葡萄种植技术的大面积推广。

1994年,父亲在责任田里种下了第一批巨峰葡萄,是西朱村第一个在良田里栽种葡萄的人。父亲此前并没种过葡萄,但他很精心,一直种到弟弟接手,直到拆迁。期间跟着市场换过不少葡萄品种,但我家直到因拆迁被迫放弃,地里仍然种着两株经济价值已经不高的巨峰,甜中带点微酸,最是可口。

父亲和弟弟种葡萄不会像其他种植户那样为了产量和外观,过量使用农药、催红素、膨大剂之类。父亲总是说,这葡萄我儿子、孙女都要吃的。这也是父亲种葡萄虽早,但没挣到什么钱的重要原因。我们家的葡萄,品相产量远不如用药物多的,而且在运输储存过程中,损耗比别家大多。我们家的葡萄每年都是零敲碎打卖给朋友的,尤其是弟弟当家的后,除了父亲摆摊零卖掉的,买我们家葡萄的其实看中的是我们兄弟的人品。

所有水果里边,我最喜欢的是葡萄,

没有之一。我一顿常常要吃2公斤巨峰。后来经济越来越发达,我自己买葡萄越来越少,无他,来自父亲的经验 and 忠告。后来物流通畅后,我在北京也几乎只吃自家种的。2023年夏天,女儿在无锡实习,我和太座陪着在武进呆了一个多月,吃了很多自家种的水果,葡萄尤多,完全不顾及坏掉的牙和胃。但是,当时我并没有想到,这是我最后能如此放肆吃葡萄的机会。

我家院子里有一株葡萄,如今应该也是网红葡萄。我在西朱的时候,异乡的朋友到我家来,首先要看的,除了那口洗澡用的铁锅,就是院子里这株遮天荫地的巨大葡萄。

大概是1987年或者1988年,父亲花6.5元“巨资”在前黄镇上买了株葡萄,回家种在菜地里,想为他的儿子谋些解馋的福利。当时,6.5元是一笔巨款,我在大学除了买书的钱,30元能支持我一个月吃喝了,1989年大学毕业工作时额定工资才58元。

这株葡萄的品种不同于本地的水晶葡萄,也不同于后来本地普遍栽种的巨峰、夏黑等。父亲说这株葡萄当时叫“白香蕉”。我后来查“度娘”,说白香蕉是美国和欧洲的杂交品种,果然出身名门。不过奇怪的是,我在故乡没有听说过有谁栽种这种葡萄的,父亲也没听说过。

白香蕉的果实个头不大,先青而后泛黄,略泛黄时口感最好,变紫就瘪了,就会自动掉落,不能吃了。父亲种这株葡萄,最初是要给他三个儿子解馋,因为产量高、质量好,后来也多送亲朋,偶尔还有人来买。1995年春天,我小弟弟学新患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住院,我前黄中学和人民大学师弟蒋国锋一直帮着照顾。小弟弟不幸去世后,父亲说,从今往后,院子里的葡萄,必须先等国锋来采过后才允许其他人碰。一到葡萄可采时,小弟弟就给国锋打电话。我1995年离开高校后,有20多年没吃到过这葡萄,直到2022年夏天才再次吃到白香蕉,不过这个时候我觉得它太过甜腻了。

2023年夏天,父亲在我们兄弟的朋友伟中帮助下登梯采葡萄时,我拍了几张照片。我没有想到,这是这株葡萄最后一季奉献给我们的果实。

2023年11月,得知老家要被拆迁的消息,父母之外,我最担心的,不是我的书房,而是这株葡萄的命运。书房随时可以重建,但一株几十年的葡萄造就的景观,全靠天时地利人和,还有时间。我需要为它找到新的安身立命之所。后来弟弟找了朋友,朋友说他准备把这株葡萄挖去栽种在厂里。这让我心里稍安。

2024年4月30日傍晚,弟弟告诉我,朋友担心葡萄太大老,且时令已晚,栽种不活,准备来挖了。我心里一沉,一晚上人的状态就不好了。晚上我在朋友圈发了对这株葡萄命运的担心,很快接到来自武进、金坛、上海及浙江的朋友的关心,他们纷纷表示愿意接手。5月1日早上,一位常州籍前辈院士给我发来了与葡萄相关的安置方法,我内心充满感激。当然,也有本地朋友想了解能否在不改变规划的情况下就地安置这株葡萄,虽然这可能是最好的办法,却被我拒绝了。即使留下了,我也再未在戒备森严的工厂见到它的可能。相反,无论在本地朋友那里,还是远到金坛、上海、浙江东阳诸地,如果它能活下来,我想见仍然可见。幸运的是,这株葡萄在本地一个朋友家的自留地上,请园艺工人帮忙栽种下来,如今已经长出新芽,成活了。

## 亲临宝岛体验两岸一家亲



①2014年5月,作者在台湾野柳地质公园。  
②十年前,台湾马路的指路牌,两头的门牌号十分醒目。  
③十年前,阿里山中的集集小镇。 作者供图



30年前为台商服务的经历只是我同台胞的初步交流,重点是工作交流,即使拉家常,也是礼节范围内的相互问候。学生时代就产生的“将来一定要去看看祖国宝岛”的愿望,终于在退休两年后实现了。2014年5月,我和一群“老三届”知青朋友赴台湾旅游8天,围着整个宝岛转了一圈。所到之处,不仅尽情欣赏和享受了台湾的美丽山水、新鲜空气,也初步考察了台湾的城乡管理和人民生活,在与台湾同胞的进一步接触中体会“两岸一家亲”的真情实感。

清晨,我们来到台北新北市的海滩公园散步。看大门的老人没到上班时间就来到了公园,知道我们是大陆长三角地区的游客时,主动热情地陪我们游览,不时指着海边景色,指点我们如何观景,哪个角度拍照最好,哪些地方有安全隐患,反复叮嘱千万别靠悬崖太近,说那里的海浪很高还有旋涡。我被他的热情和负责精神所感动,便和他拉起了家常。他说祖籍在浙江湖州,今年

58岁,65岁才能退休。退休时一定要去大陆老家寻亲祭祖,还想到北京、苏锡常和上海看看。我问:“孩子们支持你去大陆吗?”他说:“孩子都成家了,有自己的工作和收入,不用我们老人管,也支持我们外出。但现在不行,一是尚未退休,二是近来公司效益下滑,前几年的月收入可拿近6万新台币,现在只有4万多多了,所以还得好好上班,多积点钱,退休后一定要去大陆……”我们不知不觉聊了半个多小时,团队快出发了,我便与他握手告别,他站在景区门口久久地挥着手。

在高雄下榻的宾馆里,几个年轻的服务员彬彬有礼的服务使我忍不住和他们也拉起了家常。年轻人似乎更加迫切希望多知道些大陆的情况,围着我这个大陆老人问这问那。我便将我的工作和生活经历,包括做外贸工作时如何为台商服务的情况向他们做了简要介绍,并鼓励他们好好工作,多攒点钱,利用假期去大陆观光或干脆投资当老板。他们笑着

说:“大陆谁不想去啊,可是我们不知要干到猴年马月才能像你们这样退休,然后外出旅游观光呢,我们哪有本事和资本去大陆投资啊?”我说:“我年轻时当过知青和矿工,种过地,挖过煤,那时做梦也没想到今生今世能来台湾旅游,人生就得拼搏,年轻人好好干,‘前途是光明的,道路是曲折的’,将来一定会有希望的。”他们互相捶打着、说笑着:“记住长者的话哦,好好干,前途是光明的!”我说:“大陆和台湾都是一个中国,人的长相、穿着打扮、语言文化、生活习惯,甚至人生道路都大同小异,没必要老死不相往来。现在我们来,你们也可以去,礼尚往来嘛!”他们非常高兴地说:“对,都是中国人,要礼尚往来,将来我们一定去!”我被他们的朝气蓬勃感染了,似乎自己年轻了许多。

离开台湾的那天,团队放假半天自由活动,我们就从坐落于台北南京路上的首都宾馆乘出租车去一家大型超市。一路上与中

年驾驶员拉家常,问他干出租车收入如何。他说以前不行,给出租车公司盘剥去很多,两年前全台湾的出租车集中到台北政府前罢工示威,政府就取消了出租车公司,减少了中间环节,缴费下降了很多。车到目的地了,我按照打表显示的107元台币付款,可驾驶员只肯收87台币。我问其故,他说:“刚才本来可以从后面一条路拐弯的,可是在修路,我多行驶了一条街,所以要少收你们20元。”这使我们四人都感到十分惊讶,我说:“绕路我们也不知道啊,何况是修路,责任不在你啊!”他说:“做人应该诚实,不能因为外地人不认识路就宰你们。”几番推来推去,他横竖只肯收87台币。我们下车后向他表示感谢和敬意,并祝他“一路平安、好人一生平安”,他也反复说:“你们也都是好人,一路平安,我们都是平安!”多好的台湾同胞啊!假如不是亲身经历,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有如此温暖的切身感受的。

## 朋友杂忆



1985年,作者(左一)与朋友们相约在红梅公园九曲桥。

朋友圈得知他喜欢上了冬泳,很为他高兴,有这个毅力,身体一定很好。突然有一天,和我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的他的连襟打电话给我说陈君走了,几个月前生了肠癌,他一直瞒着没有告诉我。我惊讶无比。陈君生前已信佛,所以丧事在寺庙里操办。我急忙赶至寺院,和陈君见上最后一面,悲痛告别。

北京的朋友徐君,我一直说他是钢铁般意志的人。他刚退二线,就不幸罹患癌症,但他坚强、乐观,与病魔抗争,积极治疗,至今健康快乐生活。这可能和他的军旅生涯有关。我记得当年我去北京学习,听说他住院了,打电话给他准备到院探望一下。他说他出院了,问我住在哪里,没一会儿,拎了一袋水果来看我了。闲聊得知,他是当天下午才出院,可把我感动得差点落泪。这就是真正的朋友之情啊!

我有一张珍藏了近四十年的彩色照片,那是在原来红梅公园的九曲桥上拍的,照片中合影的主要是我的初高中同学,还有一位是在政法系统工作的裴君。那时候的裴君意气风发,头发浓密,牙齿雪白。三十多年过去了,我们依然保持联系,有时间就一起喝个小酒小聚一下。有时候裴君的同事参加,我总会拿出这张照片让他们猜猜哪个是我,哪个是裴君。我的变化不大,都能猜对;只有裴君,百分之八十的人猜不对。因为裴君的变化有点大,人变胖了(他自己的微信名就是“小胖”),头发少了,前不久牙齿也掉了。

我们这一代人都到了退休的年龄,大多心态很好,也都很知足。空闲时间可以经常出去走走。我愿我的朋友们每个新的一天都会充满阳光和欢声笑语,每一步都会走得坚定而有力。无论如何,我要感谢今生所有的遇见!

## 译界领袖姜椿芳

姜椿芳不仅是一个著名的翻译家,而且是新中国翻译界的领导;不仅如此,他还是一个培养翻译人才的外语教育领域的领导和专家。

1912年7月28日,姜椿芳出生在武进西横林(今钟楼区西林)。1919年,他进私塾念书,开始读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孟子》《幼学丛林》等书籍,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。1924年入东吴大学附属第二小学学习,在这所基督教教会学校,他学到了一定的基础英语。1928年,姜椿芳随家人来到哈尔滨,以优异成绩考入了省第三中学,课余时间,学习俄语。1930年,姜椿芳入职英吉利·亚细亚电报通讯社,担任俄文翻译和编辑。为保住这份难得的工作,姜椿芳见缝插针地阅读俄文报刊、背诵俄文字典、听俄语广播,找机会与俄国侨民对话、翻阅资料了解新闻背景……高强度的翻译工作使姜椿芳的俄语水平明显提高,为他将来成为翻译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1932年,姜椿芳加入中国共产党,1936年到上海任中共上海局文委文化总支部书记、《时代》周刊主编。1938年,姜椿芳担任上海地下党戏剧支部书记,是上海革命文化运动的秘密领导者之一。在这个时期,他翻译了不少于苏联戏剧。1941年,29岁的姜椿芳在上海开始创办时代出版社,1945年任时代出版社社长。上海解放后,他先后任军管会文管会文艺室主任,市化文局对外联络处处长。根据中共中央华东局指示,创办上海俄文学校(上海外国语学院前身),任校长、党委书记。

1968年,姜椿芳不幸被投入秦城

监狱。在狱中,他独自一人默默地构思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计划 and 方案。1975年,姜椿芳被释放出狱。1978年,姜椿芳出任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总编委员会副主任、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。1987年12月17日,姜椿芳因病在北京逝世。他的“衣冠冢”落在常州栖凤山。

姜椿芳的翻译活动始于1930年,其正式的翻译活动主要是为了生计。真正意义上的翻译是从1939年开始的。他的翻译主要涉及新闻、戏剧、电影、小说、诗歌、歌词、时政、科普文、文艺杂论等等(翻译涉及面很宽,姜椿芳自己说他是“杂译家”)。主要翻译作品有:《列宁书信》《斯大林论中国革命》《斯大林卫国战争时期言论集》等等。其他还有屠格涅夫、肖洛霍夫、米哈柯夫、高尔基、普希金、西蒙诺夫、果戈里、奥斯特洛夫斯基、阿·托尔斯泰、列昂诺夫等二十多人的许许多多作品的翻译。此外,还有诗歌翻译68首;文艺杂论翻译50多万字等等。

姜椿芳认为,“翻译工作对任何一个国家、民族来说,都是必要的”,“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,为了生存,为了发展,没有不利用外语,不借助翻译来做一些必要工作的”。翻译不仅是一门艺术,也是一门科学。“翻译有粗糙文雅之分,有歪曲正确之别,有浅薄精深之差,有干涩无味与细致传神之异。怎样把翻译工作做好是一种必须长期学习、娴熟掌握的艺术,是一门必须深入研究、不断提高的科学。”姜椿芳认为鲁迅的“宁信不雅”是翻译必须走的正路,即所谓“正译”。“正译是一条奋斗的道路,作为艺术,当然不会只有一条路,于是又出现两条、三条等许多条路来,无非是殊途同归,归到正路上来,达到正译的目的。”

人际交往中最重要的关系除了亲情,就是同学情、战友情和友情。岁月荏苒,我的朋友认识时间最长的有近四十年了。我和朋友们有时间就相约在一起聚一聚,或喝个茶,打个牌,小酌一杯,或一起外出旅行,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。外地的朋友难得一见,但以前出差总会相约见上一面叙叙旧。时光匆匆,转眼已步入退休行列,因此,我有了闲情拿起笔,记录下与朋友的一些往事。

沪上的朋友蔡君和本市的朋友陈君先后得了绝症,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离世。他们生前都没有告诉我,都是在他们去世后,其他亲友告诉我才知道。他们这样做也可能是出于隐私保护,不想让太多人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。但我认为他们都是出于不想让我担忧的缘故。他们当然知道我非常关心他们,一旦知道他们生重病肯定会非常担心和焦虑,并会上门探望。他们选择不告诉我,想必是不想增加我的负担。

先说说沪上的蔡君。我们是同行,因工作原因相识。他比我大,我俩刚认识时他在上海803任副支队长,后来又任缉毒支队政委,过了几年调任浦东分局刑侦支队支队长。因为从事一样的工作,你来我往慢慢就变成了朋友。大概是2002年下半年,一天,他打来电话说马上来常州,有个案子需要协助。他带了一帮人马从沪上匆忙赶来常州的时候,已临近傍晚,晚饭也来不及吃,简单介绍了案情,犯罪嫌疑人落脚处就在天宁辖区内的丽华新村附近。我们立即配合投入抓捕行动。我至今还非常清晰地记得那次抓捕的场景。蔡君身先士卒,冲在最前,佯装碰撞一下刚刚在银行柜员机上查询后快速离开的嫌疑人,好像发生纠纷的样子,其他人则乘其一拥而上,将嫌疑人抓获。经审讯,这个取款人正是作案者。此案当时在浦东影响极大,速破案后,刑侦支队和蔡君都得到了表彰。后来我调到金坛工作,先后数次去上海,都是蔡君热

情接待。及至2008年年底,我又调至溧阳工作,几次发短信息邀请蔡君来溧阳看看,他都是热情回复,但一直没有成行。2009年“五一”假期期间,我正好在单位值班,晚上接到我上海表弟的电话,他说你的朋友蔡君去世了,他刚刚在《新民晚报》上看到介绍蔡君的事迹,就赶紧打电话告诉我了。我怔在那里许久,翻开蔡君的电话号码拨打过去,是蔡君的夫人接的电话。她告诉我蔡君因长时间高强度投身工作,积劳成疾,2008年6月因肺癌入院治疗,在与病魔顽强抗争9个月,于2009年3月1日不幸逝世,他的骨灰已撒入大海。我闻言已是泪流满面,赶忙安慰蔡君夫人节哀

顺变。当年,公安部授予蔡君一级英模称号。蔡君的铜像至今矗立在浦东分局的广场上。

再说本地的朋友陈君。他的同学和我是同事,他经常来我们单位玩,然后就熟悉了,慢慢就变成了朋友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正值出国热,他家境条件不错,所以选择了去日本留学。期间,回来探亲过年,总是身穿洋服,第一时间到我办公室畅谈东瀛感受。过了几年,他从日本留学回来,就在金坛的一家日资企业当负责人。他的儿子要上高中了,夫妻俩带着孩子一起到我家征询我的意见。后来我从溧阳回常州工作,他仍在金坛工作,见面不是很多,只是节假日微信问候。从他